

同文馆·文学

帝国意识 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美〕埃娃·汤普森
(Ewa M. Thompson) 著
杨德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文学

帝国意识

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美】埃娃·汤普逊
(Ewa M. Thompson) 著
杨德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449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美)埃娃·汤普森(Thompson, E.)著:
杨德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6

(同文馆·文学)

ISBN 978-7-301-14897-6

I. 帝… II. ①汤… ②杨… III. 殖民主义-文学研究-俄罗斯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5789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by Ewa M. Thomps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Westport, CT, USA. Copyright © 2000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Mainlan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书 名: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著作责任者: [美]埃娃·汤普森著 杨德友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897-6/K·05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5 印张 30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

我的著作《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被翻译成中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十分荣幸。一想到中国这一伟大的国家的读者阅读我的著作，我就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到谦恭。我愿意简述我写作这部著作之前的学术生涯，从而把这部著作置入我的研究工作的语境之中。

在1960年代，我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和万特比尔特大学求学期间，对文学的兴趣引导我专攻三个国家的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我的博士论文涉及美国、英国和俄国的文学评论：我注意到了三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也注意到了巨大的差别。我的教学生涯始于讲授法语、英语和俄语；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为了发表有意义的学术著作，我必须集中精力研究一种文学。出自各种原因，我选择了俄国文学，并且发表了关于俄国文学的几部著作。我的著作之一已经由本书译者杨德友教授翻译成中文出版（《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北京，三联书店，1998）。我也研究波兰文学，发表了一部关于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的著作。其次，我还发表了几部关于文学理论和哲学的著作。

在我阅读和分析俄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我注意到了一个人发人深思的现象。俄国作家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帝国（存在于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苏联（1917—1991）和现今的俄罗斯联邦（1991年至今）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实体，有多达一半的人民认为自己不是俄罗斯人。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和20世纪的苏联都是如此；而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在当今的俄罗斯联邦也只有79%的人口是俄罗斯人。这样的统计资料在世界上是独特的，但是在俄国文学中没有得到反映。托尔斯泰描写了关于俄国和拿破仑的战争，他描写了战争的舞台，似乎这个舞台就在俄国——然而，战争的大部分是发生在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

多瓦、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国土上的。同样,俄国作家也描写中亚细亚,他们描写这些地区的国家,就好像这些国家一向就是俄国的,而事实上俄国在19世纪后半期才征服了这些国家。俄国作家们描写西伯利亚,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西伯利亚位于亚洲,那里居住着许多亚洲民族。换句话说,俄国文学所制造的话语涂抹和勾销了被称为俄国的一个国家里的非俄罗斯人的诸民族。

面对这一情况,我重新研究俄国文学,寻找这类涂抹行为的痕迹,或者说这一地区的真实历史所陷入其中的裂缝。英语世界现代和后现代文学评论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工具。在最近几十年,英语世界的文学评论特点之一是促进了分析技巧专门化,有助于发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里的“隐藏的”层次,这些层次在初次阅读的时候难以立即发现。举例说明。俄国作家拉斯普京创作了关于西伯利亚的短篇小说。这些故事中的不成比例的叙事注意力都用于说服读者,西伯利亚事实上就是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和俄罗斯欧洲本部是十分相似的。如果像拉斯普京说的那样,西伯利亚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还要大肆强调呢?过度强调西伯利亚的俄国属性的做法给文学评论家带来的信号是,故事作者不仅是一个文人,而且还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因为这位作者是在努力为俄国完全确定并不完全是俄罗斯的一片土地。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事例;正像我在书中论说得那样,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向非俄罗斯人推进俄罗斯人优越性的做法一向是更为微妙的。遮蔽西伯利亚的非俄罗斯的各方面情况,此类的过程在俄国文学中仍然在继续,所以那一地区的本地各民族就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因而西伯利亚的历史依然在遭受歪曲。

我收集到的足够的例证表明,俄国作家和学者,包括重要而令人尊敬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重要的学者,例如利哈乔夫,是如何从他们的作品和著作中消除“他者”的,而且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似乎只有俄罗斯人才是重要的。于是,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现在把它呈献给读者。我向中国的同行提供这本著作,希望在不损俄国文学的伟大的同时,本书能够为俄国文学的阐释增添一个新的视野。

2008年2月15日,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莱斯大学

波兰文版序

在英语世界中,后殖民主义时代研究的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后半期,本书即产生于这一语境。在这一时期内,和后殖民时代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有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大帝国的瓦解,而且还有话语的新视角,话语中对统治与归属的因素、权威与服从之游戏的注意。当然,这里涉及的不是“党的命令”,而是被普遍接受的见解,被视为牢不可破的分类法,或者只有得到具备凛然不可侵犯的声誉的科学家检验的历史“事实”的习惯性冲力。爱德华·萨义德称这一话语为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在欧洲国家流行,用来对付非欧洲国家,而且在欧洲国家对非欧洲国家的整体理解以及对欧洲宗主国地位的理解方面都颇具影响。

对英国文学或者法国文学的阐释中有这一现象的例证。在后殖民时代意识形成(萨义德的著作对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前,没有一个人敢于斗胆动笔,例如,把莎士比亚描写成殖民主义作家,任何人大概也不可能想到要把英国19世纪一位谦虚平和的外省女作家简·奥斯丁列入大不列颠帝国政治图册。

《帝国意识》把萨义德的概念用于斯拉夫人地域。该书尤其专注于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论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时代意识。该书尝试表明,在俄国文学中,政权与文学本文之间的联系也是比初看上去要深刻而微妙得多的。这些联系不仅表现在叙事者的语调和评论中,而且也同样表现在对文学形象的刻画和地理空间在读者记忆中留下的长期印象之中。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拿破仑战争的地理空间,但是,似乎没有人(当地居民除外)想到,在俄国和使用德语的诸国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小国,而且,它们的历史常常和俄国的历史多有矛盾之处。继续影响着东欧和中欧地理概念的,就有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书籍,充分意义上的帝国

意味极强的书籍,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书籍。另外一个事例:这本小说的的确确抹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奥斯特里茨战役不仅打乱和“破坏”了俄国人的、法国人的、奥地利人的生活,而且也打乱和“破坏”了捷克人的家庭生活,因为战役是在现今的捷克共和国领土上进行的。

后殖民时代意识几乎尚未触及美国和欧洲对俄国的研究。欧美的俄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复述俄国的俄罗斯研究的判断、意见、票据和发现;在俄国的俄罗斯研究之中,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几近于无。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产生过影响的是把俄国文化成果理想化的倾向,这种影响早在沙皇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在苏联时期也同样明显。把俄国文化理想化的这一传统的力量,是下面一个形象的部分原因,亦即:美国研究人员和俄国研究人员,一般都不使用后殖民时代的方法论;然而,这一方法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广泛出现在涉及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和西班牙文学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中。

本书作者希望,通过把后殖民时代方法论引入俄罗斯研究这一领域的过程,能够揭示俄国文学迄今没有被注意到的方面:这一文学对统治权力结构的依赖,这一文学对世人施加某些观察方法的努力,或者,相反:这一文学没有能力走出早已定型的话语界限,因为它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改正这种话语的不确定之处和多重干扰。

破解俄国文学(代译序)

杨德友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是美国赖斯大学汤普逊博士的一部力作,为我们理解俄国的,尤其是俄国文学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楔子、一把新的解剖刀以及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

既然标题表明本书谈论的是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就先略谈俄国殖民主义吧。

有几件涉及俄国的有趣的事,不妨简谈一下。

首先是“俄国”这个专有名词。在汉语里,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国家的简略名称,同类的还有中国、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后面这四个国家的名称是半音译的缩写)等,在汉语里,其他国家的名称因为是音译,显得烦琐些,如西班牙、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巴拉圭、尼加拉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等。

“俄国”在俄语里是 Rossiia,在英语里是 Russia,词的开端之前都没有“俄”之音。这个“俄”之音始于元朝;元朝称俄罗斯民族为“罗斯”,或者“罗刹国”。当时蒙古人用蒙文拼读 Rossiia 的时候,在 R 音前面加上了一个元音 O,所以, Rossiia 变成了 Orossiia,清朝时期就把 Orossiia 音译成为“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俄国”。至于“俄罗斯民族”中的“俄罗斯”代表的是民族,“俄罗斯人的国家”,即“俄国”。

中国人现在对这个词的使用显得混乱而麻烦;据说“俄国”是指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的这个国家,而“俄罗斯”是指 1990 年苏联解体后的这个国家。

1922—1990年,这个国家的名称是“苏联”,或者“前苏联”。虽然叫“苏联”,实质上还是俄国,因为苏联其他14个(二战后先是15个,很快减少了一个“卡列利亚—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和国都生活在俄国的阴影下面,其语言、文化、文学少为或者不为外国人所知,显得默默无闻。

笔者认为,直截了当地称这个国家“俄国”就很好;在提及20世纪的时候,可以用“苏联时期的俄国”,或者“俄国的苏联时期”,甚至“前苏联”。也许有些中国人觉得“俄罗斯”这个词亲切,这大概是一种自作多情、一相情愿的感触吧。古代俄国对中国了解有限,称中国为“契丹”(Cathay, Kitai),对于这个称呼,我们中国人未必感到亲切,但是俄国人也不会改变它。一个词语在本国和外国在语义上的微妙变化很有意思,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与俄国人心理状态和历史很有关系的还是领土问题。大略地说,从1679年(康熙十八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到1858年,中俄之间保持了大约180年的和平、平等关系。从1858年到1946年(在这一年,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同意外蒙古独立——俄国人长时间策划、唆使、包办的外蒙古的独立),俄国趁火打劫,趁中国长期贫弱、内忧外患,从中国东北、西北、北部掠夺了大约3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等于现在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的37%。

另外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1929年,苏联时期的俄国抢占了乌苏里江流入黑龙江之处的黑瞎子岛(抚远三角洲),约350平方公里。中俄在1964年开始谈判,中国要求归还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谈判延续了43年,到2007年方才达成协议:俄国占领的这块土地的一半归还中国,约175平方公里,到2008年年底才能完成归还。读者可能觉得数字枯燥,但是也有有意思的时候:俄国一共抢走中国约3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中国争回约175平方公里,亦即两万分之一。即便是如此的“半壁归赵”,可以想象,俄国也是极度不情愿的,否则何以谈判谈了大约两代人的时间。在领土问题上,俄国人一向是寸土不让的。

这些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笔者认为,历史应该得到尊重。同时,历史不应该干扰当今的地缘政治和当今的国际关系。但是,在和某个邻国关系好的时候,就不谈该国历史真相,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尊重历史,难以得到本国人民和邻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

中俄关系在 20 世纪大起大落。1917 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引导中国革命成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历史。1950 年代,中俄蜜月勉强维持了 10 年,然后两国交恶大约 30 年,直到 80 年代末才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然而,勉强维持了大约 10 年的蜜月,给中国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至今依然主导着我们国家的整体:政治体制、人事制度、经济结构、大学体制、科学院系统等等。我们今天面对的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多半与此有关。

二

现在尝试谈谈俄国文学。

1950 年代,中国被迫实行向苏联时期的俄国一边倒的政策,几乎完全拒绝了西方的古今文化,只有苏联时期的俄国和以往的俄国的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关于俄国的一切,中国人不能表示丝毫的不满和批评。俄国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从一流到末流的,都被翻译成汉语出版,据统计,在 1950 年代,约有 700 部中、长篇小说在中国面世。作品中的不少“英雄人物”,当时是家喻户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被大力推广,一枝独秀。俄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作品,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尤其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只出版一部分,大概是因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作出定论,说他是“魔鬼般的天才”吧。1980 年代后,译介到中国的现代作家有雷巴科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各个时期译介到中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无不受到十分的肯定,得到高度的赞扬。

但是,中国学人对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总体上是薄弱的,优秀的论著不算很多,而一般的评论又多倾向空泛,缺乏新意和理论的深度。然而,无论是专家论著还是一般的评论,都是踏着俄国学者的价值观、理论和语调节拍起舞,鲜有创建。

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而且也出现在欧美。出自意识形态的原

因,欧美轻视和忽视苏联时期的俄国文学,但是对俄国19世纪、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其方法和基本态度和中国的专家学者有共同之处——都逃不出俄国学者的阴影,追随俄国学者。

俄国作家的作品是对以扩张为轴心的俄国历史的崇拜、赞颂、讴歌,是歌功颂德;本书波兰语译本和乌克兰语译本都把“帝国意识”翻译成了“歌功颂德”,是很有道理的。歌功颂德,歌俄国领土开拓征战者的大功,颂历代沙皇无限扩张国策这一北极星之德。作家是这样,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亦然。

后殖民时代研究在欧美展开之后,俄国人几乎完全不予理睬,岿然不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帝国,都有作家和学者对本国的殖民帝国扩张作出反省和探讨;美国也不掩盖国土开拓的侵略掠夺史、虐待灭绝美国印第安人的史实和压迫非裔美国人问题。

例外是俄国。俄国是大陆国家,通过种种办法和策略夺得的土地都和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维)原有的土地连成一片,无限扩大,南到高加索,北到北冰洋,西到波兰,东南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东边,跨过白令海峡,占有阿拉斯加(在1867年出售给了美国)。俄国取得的这样大面积的土地,当然是殖民地,但是因为不是“海外殖民地”,所以俄国历来不承认是殖民地,也从来不承认俄国是殖民国家,历史书、教科书对于其来源的说明或者全付阙如,或者语焉不详。笔者遇到过一位俄国知识分子,他坦诚承认,他自己观看俄国远东地图,看到中国东北被俄国领土包围,感觉十分奇怪,但是对于1858—1960年俄国抢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历史,则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俄国人对于俄国殖民地扩张史一无所知,乃是俄国历来的愚民政策 and 历史障眼法等这些做法的后果之一。这是往日沙皇们和当今领袖们的既定政策。不幸的是,这样的伎俩所造成的意识也渗入了俄国文学。它使得俄国人在无意识、下意识、非意识——无知之中,化成了“祖国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长期的开始曲,化成了掩盖的严严实实的“帝国意识”。被严实掩盖的历史知识,不为俄国国民所知,但是,俄国人竟然能够做到也不让欧美人民所知。这

实在是一大“奇迹”。在文学方面,俄国作家们的态度和俄国殖民主义一致,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雷巴科夫到索尔仁尼琴,都是一样。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正是尝试向我们揭示、分析和讨论俄国文学和俄国殖民主义的关系。相信本书的中文版会引起中国学界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引发出耳目一新之感,因为中国近代史受到俄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和理解则太少、太浅,在这方面让俄国人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太长了。

本书是在2007年所出英文原版的基础上翻译的。作者为中文版写了简短序言。译者还为本书翻译了作者为该书波兰语版写的序言,以及乌克兰学者为乌克兰文版写的前言。为了翻译这篇乌克兰文的前言,笔者对照波兰文、乌克兰文和英文版本,并且参照了作者惠寄的该书的俄文片段译文,阅读几十页之后,方才读懂了这篇前言。(山西大学图书馆目录上有《乌克兰语—汉语词典》,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给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外文书店打电话求助,他们都表示爱莫能助。)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见识,感谢本书作者汤普逊所在的赖斯大学所给予的慷慨资助,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东博士对于该书的推荐。

杨德友

2008年3月20日,星期四,山西大学

摆脱帝国

——乌克兰文版前言

后殖民研究活动一步一步地到达警戒线,进入乌克兰科学研究话语和社会话语。这一事实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完全是符合规律的;乌克兰的历史可以从基督教第一个千年中期纪年,从特雷皮拉文化^①或者查卢别涅茨文化^②开始,也可以从1991年开始。这取决于从哪一种观点看待问题。但是,有一个事实很明显,现代的乌克兰人都急欲在俄罗斯语境之外显示自身的存在。无论如何,俄罗斯不仅存在于许多乌克兰人的意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现代乌克兰知识精英意识之中。这是长期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帝国文化政策造成的后果。因此,大多数乌克兰公民,包括那些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乌克兰、乌克兰文化联系起来的人,都应该脱离无所不在的俄罗斯文学的包围,都应该把俄罗斯看做是“他者”,脱离它的影响,而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乌克兰的“自身”和自我价值。

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还在于,在俄罗斯“全人类性”、“普遍性”的强横的话语中,乌克兰的教育遭受摧残。这样形成的普遍印象是,乌克兰人不必

① 特雷皮拉文化: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文化。名称来源于基辅地区的一个名为特雷皮拉的村庄,因为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文物。第一时期在公元前5300—前4600年;第二时期(中期)在公元前4600—前3200年;第三(最后)时期在公元前3200—前2750/2600年。

② 查卢别涅茨文化:铁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在大约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位于基辅地区普雷帕特河畔。从这两个时代我们至少有很好的物质文化的例证。

遗憾的是两种文化都更多地是我们“远古”历史的象征,而不是真实的知识,现在还很难证实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和斯拉夫诸民族之间的联系,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中部乌克兰的土地上,在公元前5000年已经有人类居住。

换言之,这是对于神话时代的过去的参照,还有,这里提示到了这个新国家的历史可以视为始于1991年,或者始于神话的古代的某一时期。

(以上两条注释是本书作者汤普森博士提供的。——译者)

谈论“自身”、自己的特点,因为背景是大肆宣扬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宣称要把人类从某种普遍的恶之中解救出来。

汤普逊博士著作《帝国意识》的价值就在于,她给读者提供了和俄罗斯文化、文学、俄罗斯语境保持一段距离之后得到的前景。这样,读者就能够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十分“亲切的”、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的作品和作者,看待历史上的蕴涵有含义的时刻。应该指出,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俄罗斯帝国主义不是摘自书本的、抽象的概念。俄罗斯帝国主义也是这位研究学者的亲身经验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本身自然而然地给这一著作带来现象学维度中的真实性面貌。汤普逊博士诞生于考纳斯(现在的立陶宛)的一个波兰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欧洲政治地图的显著变化,她的双亲被迫迁居波兰。

汤普逊博士在华沙大学求学,后来继续在美国万特比尔特大学学习,在那里完成了她的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论文中,她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和美国新批评学派作出比较分析。她曾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万特比尔特大学,后来和任统计学教授的丈夫在休斯敦定居。现在汤普逊博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莱斯大学任斯拉夫学研究教授。

除了《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2000)之外,汤普逊博士还有以下著作:《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文学批评》(1971)、《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1987,该书部分章节收入《萨满教:社会学中的批判概念》,2004)、《贡布洛维奇》(1979)。汤普逊博士还是学术论文集《俄国文学中对于自我意识的寻求》(1991)的主要学术编辑,《波兰评论》季刊主编,在斯拉夫研究各种刊物中发表文章。她的著作已经翻译成波兰语、汉语出版。

值得指出的是,“基础出版社”出版汤普逊博士的著作是十分适时的。可以称之为条件的巧合,也可以说是出自共同的观点。通过“基础出版社”的努力,乌克兰读者已经熟悉了爱德华·萨义德、安东尼·史密斯、罗曼·施波鲁克、安杰伊·瓦利茨基等人在著作,汤普逊博士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些人的著作。可以说,汤普逊博士的著作完全有机地融入了“基础出版社”的编委存稿之中。

在现代乌克兰学界,后殖民研究还没有广泛展开。概括地说,迄今为止,学界在这方面的成就还不够丰富;在乌克兰,这方面的论述屈指可数;马

克·帕夫利申的文集、米科利·里雅布楚克和米罗斯拉夫·施坎德里的专著;还有不涉及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理论著作,如上文提及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关的材料也收入现代文学理论文选《词汇、符号、话语》之中,该书在“编年史出版社”出版,马利亚·祖布里茨卡编辑。因此,我们可以说,汤普逊博士的著作将会填补现代乌克兰人文学科里的一个重大的空白。她的著作不仅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让读者认识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而且还能够在全新的视野中考察自己的过去和自己与邻国的关系。研究的基础是分析俄罗斯帝国的语境,而乌克兰的、波兰的及其他各国的语境,作为俄罗斯帝国殖民主义者政策的不可或缺的受害者,在这里是恒定地存在的。对于对后殖民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将会有很感兴趣地看到,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理论是可以运用到斯拉夫研究的语境中的。

本书第一章谈理论,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作者在这里谈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联系到了后殖民研究的理论、民族的与国家的自我意识形成的问题、西欧诸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在这些变迁过程中的种种差异等。在西方世界,后殖民主义首先是和种族主义、海外征服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俄罗斯帝国对邻国实施的扩张政策,学者们则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在这里也许值得提出一些术语的问题。作者遵循史密斯,使用了术语 *ethnie* (民族群体、民族性),这一术语在乌克兰学术著述中还没有推广。这个术语来源于法语,由勒内·日拉尔德推广使用。*Ethnie* 这个术语实际上是指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无意识阶段,距离国家意识还极为遥远。在这个时期,居民手里拿着狩猎工具,划定自己生存的领地,还没有考虑到创建国家。

还有一个术语值得一谈,这就是“自治领”(dominion),这个术语在传统上是指不列颠王国、后来的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中的、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而在这里,“自治领”只用在经典的意义上,指波兰共和国,虽然它参与了俄罗斯帝国的自治领,实际上是非独立的、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领地,却还部分地(在形式上)保存了某种自治的权利,一如波兰王国。

作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对于波兰共和国针对乌克兰的殖民主义者的意图没有保持缄默。作者认为,从后殖民研究背景来分析波兰—乌克兰关系还有待时日。就总体而言,她是特殊地尊重乌克兰的语境的。然而,

汤普逊博士的研究首先是面对西方读者的,而且是依据历史事实、文献资料作出的,对于乌克兰读者来说,这也并不新奇。与此同时,理所当然和令人愉快的是,有这样的学者,不辞劳苦,向西方读者作出解释,基辅罗斯原来是什么,俄罗斯从哪里起源,则情况就不一样了。此外,汤普逊博士还揭示了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和后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和乌克兰人自己许多的现实问题。作者直接指出西方片面接受斯拉夫文化的方式,而这类方式正是俄罗斯帝国主义表现自己的话语形成的。作者认为,西方后殖民研究理论家们对于两位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或者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缺乏认识”和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此。

作者所援引的我们的社会历史事件,在乌克兰是鲜为人知的。比如苏沃洛夫 1794 年在华沙近郊发动的屠杀事件,平民有大约两万人死亡。有多少代的苏联人受到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苏沃洛夫的英雄气概和军事天才楷模的教育,而生长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人,却很少有人对这位将军持以批判的眼光,从自己的、乌克兰人的观点、而不是从苏联—俄罗斯宣传培育的立场来看待这位大人物。

苏沃洛夫的事例是作者在自己著作中引用的许多事例之一,用以逐步揭示宣传了几十年的、得到普遍接受的历史的“同源性质”,提出每个人都有权利脱离官方宣传,研究知名人物和事件。

使得汤普逊博士的著作在研究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各种著作与众不同的重要事实之一是,作者注意到了前人常常忽视、或者只得到片面解释的民族主义的现象。和研究民族主义的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她区别了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和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旨在把自己的民族身份强加给其他民族,这种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带来的破坏性的力量;而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的基础则是获取自己的民族身份。

俄罗斯民族主义同时既是防御性的,又是扩张性的。在俄罗斯的话语中,在俄罗斯和西欧诸帝国的关系上,既存在着自卑情结,同时也存在着追赶、超过西方的欲望。作者详细而专注地用实例提出对于俄国古典文学的分析,展现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产生和运作的机制,指出将二者区分开来的细微界限。

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都是作为俄国文学的荣耀进入了我们的意

识的。在中学时期,我们就熟悉他们作品中的高加索题材,却很少考虑到,在他们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作者通过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高加索人物”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和扩张性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重要事实,这样的民族主义为俄国殖民主义者的激情打造了基础。汤普逊大概是借助于后殖民研究工具分析了普希金的《1829年远征期间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的第一位学者,她揭示了这本旅行记的殖民主义底蕴。

的确,像《高加索的俘虏》、《阿尔兹鲁姆旅行记》、《当代英雄》这些作品属于帝国语境开创初期,这些事件都气势汹汹地、强硬地宣告俄罗斯帝国在高加索和其他地方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些现象的殖民者激情昂扬地出现在读者面前。高加索战争的英雄、俄国军事史的荣誉与自豪感、叶尔莫洛夫将军,都以最大限度的确定性出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精辟的论断也说明了20世纪与高加索问题相关的事件,这些事件过去和现在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早在本书理论部分揭示反殖民主义探索和后殖民研究探索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作者就表明,只要俄国一天不过渡到后殖民时期的立场,高加索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而且,车臣的互联网页也显示了反殖民意识的典型的增长。

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分析是特别令人感兴趣、初看上去又是出人意表的。托尔斯泰在西方读者当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这位俄国古典作家作品里张扬了普遍性和“人性”。作者指出,在托尔斯泰的先驱者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赶上西欧帝国的欲望,而《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则感觉自己和他们“平起平坐”。库图佐夫不仅和拿破仑完全平等,而且被描写得足智多谋,和这位法国对手不相上下。作者对托尔斯泰的叙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极为认真地看待,同时表明,在俄国人的“普遍性”的障眼法的后面隐藏的是对于中部欧洲的弱小国家和民族、有意识地视而不见。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考虑到那个奥斯特里茨到底位于什么地方,在什么人的天空下造成了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再生,有谁会想到在19世纪初那场遥远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紧要的大事乃是——俄罗斯帝国在这里被描写成为欧洲大国俱乐部的平等一分子,而沙皇亚历山大则是与欧洲众皇帝平起平坐的。

作家接受这种宣扬俄国人属于欧洲先进民族的既定方针是为了取得国际的平等地位,而不仅仅是作为小说的情节发展进程。在这一语境中,有摘